

第一批國籍主教

梁德瑞

1 天主教在華發展史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天主教是在公元 635 年景教教士阿羅本 (Alopen) 抵達長安時傳入中國，有些學者則認為應以 1245 年方濟會士柏郎嘉賓 (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 到蒙古傳教為開端，也有些學者認為應以 1294 年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抵達北京為起點。由於景教信奉聶斯多略異端，在教義上與羅馬天主教水火不容，故難以說景教是天主教的一部份¹。此外，柏郎嘉賓前往中國的目的是與蒙古修好，建立教廷和蒙古通使的關係，但並沒有達到傳教的目標²。因此，本文在談及天主教在華傳教史時，將以孟高維諾抵京為始，把天主教傳入中國七百多年的歷史分為下列三個時期：

- 十三至十四世紀方濟會時期
- 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時期
- 二十世紀國籍主教時期

1.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7 頁

2.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8 頁

本文將簡略提及以上每個時期的中國歷史背境，當時國籍神職培育的情況、他們在中國傳教區內的地位和首批國籍主教產生的經過。最後，將總結祝聖首批國籍主教的意義及對中國教會發展的影響。

2 國籍主教的出現

2.1 十三至十四世紀方濟會時期

雖然柏郎嘉賓未能打開中國傳教之門，但在1266年，元世祖卻主動要求教宗派遣教士到中國傳教³。於是，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了方濟會士孟高維諾，以教宗欽差身份，於1294年到達北京傳教，成績斐然。於1313年，孟高維諾受到由教宗格來孟五世所派遣的方濟會士主教祝聖，成為中國傳教區總主教及遠東宗主教，孟總主教隨即先後委派這些方濟會士到泉州出掌教務⁴。那時北京教友數目已逾三萬⁵。

當時外方方濟會傳教士及神職人員負責一切傳教和牧民工作，他們為天主鞠躬盡瘁，為建立中國教會不遺餘力。孟總主教及泉州的主教分別約在1328年及1332年間去世，他們都後繼無人⁶。雖然據資料顯示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確知孟總主教去世後，於1333年立了一位名叫尼各老的方濟會士為孟總主教的繼位人，而尼各老和數位方濟會士也於翌年出發前往中國。可是，竟在1338年七月，一批中國皇帝代

3. 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10頁

4. 金普斯及麥克羅斯基，《方濟會來華史》，第3頁

5. 劉嘉祥，《剛恆毅樞機回憶錄》，第136頁

6. 金普斯及麥克羅斯基，《方濟會來華史》，第3頁

表從北京到達阿味農(Avignon)，向教宗呈上一封由中國阿蘭人於1336年寫的信，要求教宗派遣傳教人員到中國⁷，因為自孟總主教去世起，中國的信眾已沒有人照顧。

由於教宗本篤十二世認為前任教宗所委派的尼各老等人已抵北京，故沒有再打發另一位主教，只派了五十位方濟會士前往中國。這些使者終在1342年抵達北京，開展傳教工作。使者中一位名叫若望馬黎諾里(Joannes de Marignollis)携同一封中國皇帝給教宗的信，於1353年回到阿味農。信中內容是要求教宗或至少一位全權代表教宗的主教到中國⁸。雖然教宗立即與方濟會士們商討此事，唯當時於歐洲流行的黑死病，教廷和方濟會本身的內部問題，令教宗無法派遣傳教士到中國⁹。

直到1370年，教宗烏爾巴諾五世把主教的權柄賜給一位名叫偉廉的方濟會士，打發他和十二位方濟會士到中國傳教，但由於1377年至1398年的教宗檔案的消失，我們無法知曉這些傳教士的結局。憑藉一位道明會若望總主教在1404年的記述，證明在他的時代還有一位方濟會的加路主教在北京任職，但自加路主教去世後，再也沒有人到北京處理教區事務，而北京教區也在1410年被教會除名¹⁰。

隨著元朝於1368年的結束，天主教的發展也開始中斷。引致天主

7. 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18頁

8. 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19頁

9. 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20頁

10. 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25頁

教傳教事業中斷的原因很多，除了教宗未能打發傳教士到中國外，明朝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不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再加上缺乏中國國籍司鐸及主教，也導致當時的中國教會後繼無人。

2.2 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時期

直到耶穌會士利瑪竇於 1583 年來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工作才重新熱烈地發展起來。這階段的傳教工作，由耶穌會開始，後有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努力，於 1650 年時，教友的數字已達十五萬¹¹。

由利瑪竇來華到明朝滅亡期間，中國朝廷沒有承認境內教會團體的「合法性」，但也沒有予以否定¹²，教會的傳教活動都是祕密進行。直至清朝康熙帝於 1662 年登位，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範圍才有較大的擴展。康熙帝在 1692 年正式允許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而中國人民也擁有宗教自由¹³。這項宗教政策的改變，的確為傳教士提供一個非常有利的傳教環境；可惜由於教廷信理部於 1645 年下令禁止中國教友舉行敬孔祭祖之禮，引發了「禮儀之爭」¹⁴，也使康熙帝在 1721 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¹⁵。此後，繼位的雍正帝、乾隆帝和嘉慶帝均對天主教抱有仇視或懷疑態度，故他們在位期間，會出現多

11. 劉嘉祥，《剛恒毅樞機回憶錄》，第 136 頁

12.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16 頁

13.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23 頁

14.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322 頁

15.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28 頁

次教難，使傳教活動陷於非常艱難的境況。但到嘉慶晚年，全國仍有約二十萬名教友¹⁶。

當時中國教會仍由外國聖統及修會管理和主持¹⁷。但1664年所發生的教難，令數十位外籍傳教士只可在廣州活動，全靠一位國籍神父——羅文藻獨力承擔當時的傳教工作，傳教事業才沒因此停頓。他不單對面對教難的教友作出鼓勵，也引領超過二千五百名新教友加入教會，深受遠東各傳教會敬重¹⁸。

在培育本地傳教士和神職人員事上，外籍傳教士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在1732年以前，經已有不少中國青年在曼谷、馬尼拉及澳門等地學習修道¹⁹。唯當時外籍傳教士不重視甚至反對培育中國神職人員為主教，忽略了這項培育對中國教會長遠發展的重要性。

他們反對的主要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項²⁰：

- 本地人神哲學修養不深，恐不能稱職
- 本地人在中國禮儀問題的意見與羅馬教廷意見不符
- 由於當時的外籍傳教士均由該國政府資助及保護（此稱為「保教權」），故他們理當成為主教

16.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35頁

17. 劉嘉祥，《剛愎毅樞機回憶錄》，第136頁

18.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19頁

19.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32頁

20.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20及39頁

● 在鴉片戰爭及不平等條約簽定後，保教權情況更爲嚴重，中國神職人員更處於被壓抑的地位

幸得天主聖神的帶領，令當時的教宗明白委任本地人爲主教的重要性，故教宗格來孟十世在 1674 年頒佈了《在座堂上》諭令，委任羅文藻，道明會士，爲南京代牧，而羅文藻最終也於 1684 年四月八日在廣州接受祝聖，成爲第一位國籍主教²¹。但在談及第一批國籍主教時，羅主教並不被包括在內。首批國籍主教的受祝聖與羅主教的任命相距了二百多年之久。

2.3 二十世紀國籍主教時期

十九世紀開始，中國國力衰落，受到多國欺壓，簽定了很多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能在中國境內獲得具大利益。而天主教會亦因依恃外國勢力，可以公然進行傳教活動，但同時也引起了信眾對天主教會的不滿，留下了天主教是洋教的觀念。

由於中國教會由弱勢轉爲強勢是靠外國勢力，外籍和國籍神職自然分別處於主導和次要地位²²。二十世紀初的義和團事件、辛亥革命、民國的成立和日本侵華等混亂局勢，也沒有把外籍神職主導中國教會的情況改變。可是，漸多外籍傳教士開始認爲當時是中國人管理中國教會的時候²³。

21.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18 頁

22.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20 及 39 頁

23.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43 頁

中國國籍主教的出現，實有賴雷鳴遠神父的推動，比利時樞機主教 Mercier 的協助，把當時正受法國保教權影響下的中國教會實況報告教廷²⁴。教廷得悉中國教會未能享有自治權後，遂委任剛恆毅總主教為首任駐華宗座代牧，目的是協助中國傳教事務的發展²⁵。

剛總主教對中國教會帶來多項貢獻，在擢升中國國籍主教及建立中國國籍主教區方面，貢獻尤為顯著。剛總主教認為建立中國國籍主教區是必要的，因為²⁶：

「聖父曾說我們的教務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進展地步。聖父既把向教外人宣揚真理的宗徒任務委諸位(教區首要)，所以本國籍的司鐸們不應該只是居於助理一些次要的事務的地位而已。因此，在諸位的傳教區內，不該只求有多數的修生，而更應該注意的是他們的教育和陶成。若在這些栽培成就的本國籍的司鐸中，有才德兼優的，儘可以委任為本堂司鐸，或成為本區主教，亦無不可。」

剛總主教在 1926 年三月收到傳信部長汪老松樞機主教 (Cardinal Van Rossum) 的來函，說明教廷為了中國教會發展的益處，考慮把宣化府升格為監牧區，而且這監牧也能在羅馬受到教宗親自祝聖。剛總主教對此事十分欣喜，並加緊物色其他合適的教區和主教人選²⁷，並

24. 成世光，《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第 6 頁

25. 保祿，《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第 18 頁

26.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 43 頁

27. 保祿，《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第 21 頁

終於在 1926 年十月二十八日親身帶領六位中國國籍司鐸，接受教宗庇護十一世的祝聖。

根據剛總主教的記述，他和六位準國籍主教到羅馬後翌日，教宗便要接見他們。教宗慈祥地逐一擁抱了身穿中國服的六位準國籍主教，流露出由心而發的喜悅。剛總主教把這情景形容為「東西雙方吉祥的會晤」²⁸。

1926 年十月二十八日耶穌君王節早晨六時，羅馬貴族、外交使節、教會首長、修女、羣眾、樞機團和騎士隊已湧往聖伯多祿大殿。當教宗到達時，大殿頂部頓時大放光明，在悅耳的歌聲中，授杖、加冠、平安禮等禮儀共進行了五小時之久。

六位被祝聖的國籍主教包括²⁹：

- 成和德主教 - 蒲圻代牧
- 朱開敏主教 - 海門代牧
- 胡若山主教 - 台州代牧
- 陳國砥主教 - 汾陽代牧
- 孫德禎主教 - 蠡縣代牧
- 趙懷義主教 - 宣化代牧

28. 劉嘉祥，《剛恆毅樞機回憶錄》，第 140 頁

29. 教友生活周刊，《首任國籍主教祝聖六十年暨聖統建立四十年紀念特刊》，第五版

在靜聽教宗訓言後，六位國籍主教向教宗表示他們不怕死亡，並感謝對將真理帶到中國土壤的傳教士³⁰。接著六位國籍主教穿越聖伯多祿大殿向人民祝福，執行了第一次主教職務。

3 六位國籍主教簡介

以下將簡單介紹六位國籍主教的生平³¹。

3.1 成和德主教 - 蒲圻代牧 (1873-1928)

成和德，聖名奧多利各，祖籍湖北襄陽老河口。於1894年在拉維納 (La Verna) 加入方濟會，1900晉鐸。1903年回國傳教，1907年至1921年任茶園溝修院副院長。成主教學貫中西，特別精通拉丁文和樂理，為外籍傳教士所敬慕。1924年榮昇為湖北蒲圻監牧³²，成為繼羅文藻主教後，第一位中國監牧主教，雖未領受聖品，也以此身份參與了1924年於上海舉行的全國主教會議。終在1926年十月二十八日，成主教才與其他五位國籍神職於梵蒂岡接受祝聖，成為中國國籍主教。回國後，繼續為地脊民貧的蒲圻服務，教友數目倍增，唯成主教於晉昇主教後兩年離世。

3.2 朱開敏主教 - 海門代牧 (1868-1960)

朱開敏，聖名西滿，祖籍上海，生於公教家庭，自少深受宗教教

30. Octave Ferreux P C M, 《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 551 頁

31. 教友生活周刊, 《首任國籍主教祝聖六十年暨聖統建立四十年紀念特刊》，第五版

32. 趙慶源, 《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72 頁

育。於 1888 年加入耶穌會，1898 年晉鐸。1898 年至 1926 年期間，於常熟、無錫、江陰、海門、南通等地傳教，成爲通海總鐸。1926 年八月十一日被委任爲海門代牧³³。於 1926 年於梵蒂岡接受祝聖後，成爲海門地區首任主教，管轄海門、通州、崇明、啓東、如臬、泰興、靖江。朱主教於海門創辦錫類中學、主心小修院、國籍修女會（嬰德會）、並建主教公署，致力培育本地聖召。朱主教特別恭敬耶穌聖心，死前曾立以下遺願：

「我謹向聖伯鐸宗座表示忠貞不渝，我把一切，都托付予耶穌聖心……雖然我深受折磨、迫害，但我對教宗的一切指示與決定，已拿出了我的赤膽忠心，予以服從和擁護」。

3.3 胡若山主教 - 台州代牧 (1881-1962)

胡若山，聖名若瑟，祖籍浙江定海。幼年加入定海修院求學，後於寧波大修院攻讀神哲學，再轉讀嘉興大修院，於 1906 年加入遣使會，1909 年於嘉興會院晉鐸。晉鐸後於台州傳教一年半，後任若瑟學校校長三年之久，繼擔任小修院教員³⁴，後調任寧波大修院神哲學教授。於 1926 年七月被選爲亞爾美尼亞德，阿多西堡城領銜主教，同年八月被任爲浙江台州代牧³⁵，同年十月被祝聖成爲首批國籍主教之一。回國後，胡主教熱心教務，在文化事務方面，創辦了「台州教區月刊」；慈善事務方面則設立孤兒院、診療所等。胡主教因共產黨於

33.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83 頁

34. Octave Ferreux P C M，《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 554 頁

35.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83 頁

1949年成立，精神大受打擊，最後被中共監禁於杭州，於1962年離世，享年八十一歲。

3.4 陳國砥主教 - 汾陽代牧 (1875-1930)

陳國砥，聖名類思，祖籍山西路城夜陽，其父務農，家道小康，十四歲時加入小修院，後有意跟隨聖方濟之苦行，於1896年加入方濟會，1903年於太原洞兒溝晉鐸。晉鐸後於忻縣傳教，成績有目共睹，被譽為忻縣教務之創始人。1911年擔任太原主教座堂之本堂司鐸，兼任主教華文秘書，並籌辦明原學校（晉省唯一公教中學）。

1915調往太谷任本堂司鐸，直到1921年，出任明原學校校長，同時在大修院教授教義辯護學，並身兼晉西十二堂之總堂職，傳教於軹縣等地。1926年五月十日被委任為汾陽代牧³⁶，同年十月領受聖品成為國籍主教後，以亞都達主教銜帶領汾陽宗座代牧區信眾。雖然當時汾陽是初創教區，信眾數目甚少，但憑著陳主教的帶領和信眾們的努力，汾陽修院在不足一年間便矗立城中。

3.5 孫德禎主教 - 蠡縣代牧 (1869-1951)

孫德禎，聖名默爾爵，祖籍北京，自幼於大、小修院修道十四年。於1899年晉鐸，數年後加入遣使會精修。孫主教天資過人，文學詣藝特強，精通中、法及拉丁文，特別在拉丁文方面名噪中國。孫主教於天津、倉縣、鹽山、京東等地傳教十二年，並在北平小修院執教

36.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83頁

十二年。1924 年受教廷委任為蠡縣監牧³⁷，1926 年成為國籍主教，以愛斯本主教銜領河北蠡縣監牧區。河北蠡縣監牧區於 1929 年被升格為宗座代牧區，改稱安國宗座代牧區³⁸。孫主教於 1936 年退休。孫主教一直都以「廣佈聖道，榮主救靈」為職志，故退休後仍不斷為許多教區、會院和修院主持靈修、退省等神修事務。

3.6 趙懷義主教 - 宣化代牧 (1878-1927)

趙懷義，聖名雅各伯，祖籍北平長辛店，生於公教家庭。自幼加入北平教區小修院，畢業於文聲神哲學院。晉鐸後參與傳教工作，擔任北平毓英中學校長，後又任剛恆毅總主教祕書，1926 年五月十日委任為宣化代牧³⁹，同年十月成為國籍主教。返國後於宣化主教座堂舉行就職典禮，嘉賓及教友共同熱烈慶賀。1927 年河北省內戰興起，引致大批傷兵及難民聚集於主教座堂，趙主教慈悲為懷，在一個風雨之夜前往慰問。眼見難民的苦況，趙主教馬上把自己的外衣披在難民身上，因而自身著涼，引致舊病復發，從此臥病不起，任主教職僅八個月便安息主懷。

4. 任命六位國籍主教的意義工作 及對中國教會發展的影響及貢獻

雖然第一批國籍主教只有六人，但擢升中國國籍主教一事卻為普

37.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72 頁

38.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88 頁

39. 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第 83 頁

世教會及中國教會帶來深遠影響。

4.1 顯露天主教會「大公」的特性

教廷沒有因種族而歧視中國人，沒有拒絕晉昇中國人爲主教。相反，祝聖中國國籍主教的行動，完全反映了天主教會「大公」的精神。曾有一位中國部長對剛總主教說：「教會的大公性在中國以前幾乎很難令人了解；從此(擢升六位國籍主教)已成爲顯明的事實了。」⁴⁰

4.2 提升中國及中國教會的地位

在1926年間，中國仍受着外國的欺壓，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但六位國籍主教的出現，正好向世界顯示中國人並非外國人所認爲般無能，而是中國人也有資格作主教。所以，擢升六位國籍主教的事，立時提升中國教會及中國國際的地位⁴¹。

4.3 加快天主教在中國本地化的速度

首批國籍主教領受聖品是落實了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所頒發的《夫至大至聖》(Maximum illud) 通諭。通諭明確指出：「有些傳教區域，天主教已傳入了數世紀，而本地神職人員，至今只居次等的地位……給他們以適當的栽培和教育，實屬刻不容緩；倘欲產生預期的效果...給他們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傳教士的助手，卻當使

40. 穆啓蒙，《中國天主教史》，第133頁

41. 牛若望，《剛恆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第14頁

他們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⁴²。自首批國籍主教產生後，中國教會更着重培育國籍司鐸和主教。由於國籍主教了解中國本土文化，較易把信仰本地化，使信眾更易明白天主教信仰和有關禮儀的真義，令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再把天主教看成洋教，而教友的數目也因此而增加。

4.4 奠定中國教會聖統制的基礎

雖然日本於1937年開始侵略中國，但中國教會並未因此而萎縮。相反，在外籍、國籍司鐸和主教的帶領下，中國教友沒有因艱苦生活而放棄信仰，更因為他們成熟慷慨的表現，不單維持了傳教士的生活和學校經費，也引致在1936年至1937年間，教友數目由3,018,000增至3,274,000，國籍神職人員的數目也由1,897增加至2,698⁴³。

得悉中國教會成熟的表現，教廷終於在1946年正式在中國建立教會聖統制。全國分為二十教省，二十總主教區和117個教區⁴⁴，當時共有二十九位國籍主教獲委任為教區主教或總教區總主教⁴⁵。

42. 穆啓蒙，《中國天主教史》，第131頁

43. 林漢野，《天主教在中國》，第8頁

44. 林瑞琪，《誰主沉浮》，第326頁

45. 穆啓蒙，《中國天主教史》，第135頁

參考資料

1. 《誰主沉浮》，林瑞琪著，聖神研究中心，香港，1999年1月1日第三版
2. 《中國天主教史》，穆啓蒙編，侯景文譯，光啓出版社，台灣，1971年7月初版
3. 《方濟會來華史》，金普斯及麥克羅斯基著，李志忠譯，香港天主教方濟會，香港，2000年6月初版
4. 《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韓承良著，思高聖經學會，台灣，1994年9月初版
5. 《首任國籍主教祝聖六十年暨聖統建立四十年紀念特刊》，教友生活周刊，台灣，第五版，1986年12月11日
6. 《遣使會在華傳教史》，Octave Ferreux P C M 著，吳宗文譯，華明書局，台灣，1977年10月初版
7. 《剛恒毅樞機回憶錄》，劉嘉祥編，天主教主徒會，台灣，1992年1月
8. 《剛恒毅樞機主教使華七十週年論文集》，張振東編，天主教主徒會，台灣，1992年4月
9. 《天主教在中國》，林漢野著，中國學人出版社，香港，1976年9月初版
10. 《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趙慶源著，聞道出版社，台灣，1980年9月